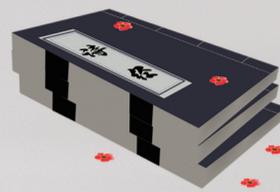




《诗经》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



作为五经之一,《诗经》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、中国文化的发展,而且远播海外,对世界尤其是东亚、东南亚的文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儒学与汉字在秦汉时期已传到越南,随着汉武帝置九郡、推汉化,越南通晓汉学的人士渐多,《诗经》随之传入但影响有限。时至越南李朝,统治者崇儒意识渐强,儒家思想便由政治领域扩及文化、教育、学术等领域,《诗经》也得到了其后越南统治者的青睐。从15世纪越南黎朝起,儒学成为越南

社会的主流思想,在其影响之下,中国文化在越南日益占据重要地位,并逐步实现本土化。

《诗经》翻译与研究在越南有着深厚的基础,历朝历代《诗经》在越南的传播形式以译介为主,吸引了众多越南学者参与,其中部分成员也成了越南儒学的研究中坚,代表人物有:胡季犛、冯克宽、阮季孝、谢光发、范氏好等。其译介传播大体经历了“汉喃文字”时期和“拉丁化文字”时期两个阶段。 唐海宏

“汉喃文字”时期:《诗经》的本土化转译

“汉喃”是早期越南人的主要文字,包括汉字与越南人自创的字喃,后者基于汉字原则,用于记录越南语。《诗经》在越南的早期传播得益于中国汉代锡光、任延、士燮等人,特别是士燮使其广泛流传。

胡朝创立者胡季犛深爱中国古典诗歌,首次将《诗经》等转化为字喃诗,开创越南式阐释新途径。此后,冯克宽、阮季景、阮贴、阮贵愨、阮伯璘、阮辉莹等越南学者对《诗经》进行了注释、释义、翻译等工作,形成了众多字喃译本和散译文本,如阮贴译有《诗经解音》等。

现今越南汉喃研究院保留有多个《诗经》作品、文本和书号,译文共计5368页。从保留的指令翻译书来看,越南还曾先后翻译有《诗经演音》《诗经正义传演音》等作品。《诗经》在越南被多次译介,与其文学与经学的双重身份及翻译者的“崇经、崇文”理念密切相关。翻译方式则包括“全译”与“节译”,如《五经节要演义》为全译,工作量大、体例丰富,而《十五国风演音》《幽风七月歌》则为节译。

“拉丁化文字”时期:《诗经》的现代化重构

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后,法语、法文化成为主流,汉学失去主导地位,拉丁拼音式的越南国语诞生,汉字、字喃不再是官方文字,但仍被文化研究者用于《诗经》研究。范廷粹是最早节译《诗经》的越南学者之一。

20世纪《诗经》进入越南国语译本时代。阮思大、阮季孝、严尚文等学者相继翻译《诗经》,译本结构包括诗篇标题、词语注释、义译韵译等部分。其中,1964年谢光发译出的全三册《诗经》译本规模最大、最完整,包括汉字原文、义译、韵译、批注等,后经过多次修改和出版,成为越南最为完善的《诗经》译本。

此外,范氏好、陈黎创等学者也进行了《诗经》的

节译和译注工作。现代越南学者陈重金、阮百科等,以及当代越南汉学研究者陈俊凯、陈黎宝等积极投身《诗经》研究,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。

《诗经》在越南的广泛影响

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《诗经》,在越南历史长河中扮演着独特角色,既像文化基因般深植血脉,又如精神纽带连接古今。越南对《诗经》的本土化诠释,既保持了东方文明的精神内核,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色彩。在千年的传播中,《诗经》早已成为越南汉学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政治、教育、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越南带来广泛影响。

两千年前,当汉朝官员在越南设立最早的教育机构时,《诗经》便随着儒家思想的春风化雨,悄然重塑这片土地的价值理念。士燮更以“化俗淑心”为纲,使“通诗书、习礼乐”蔚然成风,令越南初具“文明之邦”气象。越南李朝时期,越南统治者巧妙地将《诗经·关雎》中“后妃之德”与本土信仰结合,既保持家庭伦理的教化功能,又赋予女性财产继承权——这种“儒家伦理越南化”的智慧,展现东方文明特有的兼容并蓄。

在政治层面,《诗经》既是古代越南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重要文本载体,也是越南民族精神的强心剂。在古代越南,《诗经》曾是儒生读书入仕的必备教科书,李朝曾把《诗经》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,陈朝科举考试中《诗经》题目占比超过三成。在18世纪法国殖民时期,越南知识分子将《诗经·黍离》的亡国之痛转化为抵抗檄文,让古老诗篇迸发出民族觉醒的力量。这种“以诗为剑”的传统,印证着经典文本在历史转折中的永恒。

在教育传承中,《诗经》始终是打开文明之门的钥匙。从古代私塾到现代大学,从汉字教学到双语

教材,这部经典不断被赋予新形态。如今,在河内大学开设的《诗经与东南亚歌谣》课程中,学生们通过比较研究探寻越南传统民谣中藏着的《诗经》韵律密码。越南许多人文大学汉喃专业设有45课时的《诗经》精讲,每课时要品读两到三首诗。

《诗经》在越南文化方面的创造性转化尤为动人。越南诗人将《诗经·关雎》中的水鸟意象,置换为湄公河畔的翠鸟,用本土化的六八体诗律重述爱情故事。阮朝《同庆地輿志》记载的8500个越南北部村社中,130个地名暗合《诗经》语汇——那些名为“葛覃”“采芣”的村落,正是诗教精髓渗入山河肌理的鲜活印记。当《诗经·七月》中的农耕时序演变成红河三角洲的插秧歌谣,当带有《诗经》韵律的“越南歌谣”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,传统文化在当代完成了惊艳转身。

《诗经》在越南的传播历程中,从字喃到拉丁文越南国语翻译,从编入有关教材、论著,到着重于介绍、翻译、注释,进而到批注、撰写各种衍义,从古代的科举考试内容到现在的大学课堂,《诗经》日益被越南社会各阶层所接受,成为中越两国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。 据《学习时报》

文学家梁实秋是个幽默的人,他常在文章中把人们在生活中的一瞬间的表现、神态、感受描绘得惟妙惟肖。但给人的感觉不是尖酸刻薄,而是淋漓畅快、轻松自然的幽默,留下无限回味。放在今天,他就是一个优秀的“段子手”。

比如,在电影院里看电影,遇到邻座人的大腿不停地抖动,他写道:“忽然觉得身下坐着的椅子颤动起来,颤动之快慢急徐,恰好令你你觉得他讨厌,左右探查震源,忽然又不颤动了。在你刚收心来继续看电影的

“段子手”梁实秋

时候,颤动又来了。”把令人讨厌、气愤的事情一下子化为诙谐好笑,何其幽默!

再比如他写遛遛的男人:“有些男人,西装裤尽管挺直,他的耳后脖根,土壤肥沃,常常宜于种麦。”他吐槽隔壁邻居半夜的歌声,“我原谅他,他怕鬼,用歌声壮胆,其行可恶,其情可悯”。他讲婚礼:“假如人生本来

像戏,结婚典礼便似“戏中戏”,越隆重越像。”

又比如描写动物,梁实秋把狗扑咬陌生人的样子说成“声色俱厉”,把无主的狗说成“没有背景”。在描写野狗时写道:“普通的野狗都是些不修边幅的夹尾巴的可怜东西,就是汪汪地叫起来也是有气无力的,不像人家豢养的狗那样振振有词、自成体系……”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

一切场景,都是从生活中来,梁实秋以幽默风趣的语言,还生活本来面目,又引人思考。读着读着,想着想着,便忍不住要笑起来。 周丽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启功毛笔七分钱

网上流传一段拍于20世纪60年代的视频,视频中,启功(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常委)一边手执毛笔写字,一边讲解着执笔要领。在谈到所使用的毛笔时,启功说:“我这笔七分钱一支,是衡水公社社员在农闲时候做的,做了之后,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的一些文具店、纸店里卖,并且当成处理品。因为太便宜了,我们一次就买上一百支、二百支的。这个笔非常好使,我觉得比那些价格很贵的笔还好使。”

启功所提到的衡水毛笔,据有关人士回忆考证,是衡水侯店村制作的。侯店毛笔在明永乐年间开始兴盛起来。清光绪年间,因制作技艺精湛,被选进宫内,作为

“御用之笔”。1915年,侯店毛笔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奖章。20世纪30年代,侯店从事毛笔行业的人员达700多人,几乎家家从事毛笔制作,年产毛笔500多万支,品种多达270多种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群体。衡水侯店村因此被称为“毛笔圣地”“北国笔乡”。侯店毛笔笔长杆硬,刚柔相济,含墨饱满而不滴,行笔流畅而不滞,与衡水内画、宫廷金鱼并称为“衡水三绝”。

启功的书法艺术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的成就上,自辟蹊径、独创一格,被世人称为“启功体”。启

功虽然有许多光彩照人的头衔,但是他却十分谦逊、低调,他经常说:“我的主业是教师。”在他的名片上也只有两行字:北京师范大学、启功。虽然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,可启功从不提及。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,有人给他寄来一封信,上写“爱新觉罗·启功收”,他连信封都不拆,直接在上面标注:“查无此人。”旁人不解,启功说:“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、户口本,从来就没有‘爱新觉罗·启功’这个人。”

据资料介绍,启功写字的桌子只有两尺见方,用了20多年,文房四宝一概不讲究名贵。启功在视频中也说道:“越好纸好笔写起来越感到紧张、越写不好,这个就写得随意。” 郑学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